

## 宗教视域下西夏人与普米族的族属关系<sup>\*</sup>

熊永翔

提 要：普米族与西夏人的自然崇拜、鬼灵崇拜和巫术占卜等原始宗教系统非常相似。本文根据调查材料，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对两族关系进行初步探讨，认为西夏人与普米族在不同时代所呈现的宗教信仰的相似性，反映了同为古羌民族共同的源流、亲缘及迁徙的历史痕迹。

熊永翔，普米族，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西夏 党项 普米族 宗教关联

我国北宋年间（1032—1227），在现今宁夏银川地区曾建立过一个由西部少数民族党项族为主体所建立的大夏国，史称西夏。在近二百年间，西夏完善各种制度，创造了具有党项民族特色的西夏文明，直到1227年为新兴的蒙古所灭。关于西夏政权的主体民族党项族的族源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较集中的有两种观点，一是“西羌说”，认为创立西夏的拓跋部是党项拓跋部，党项是古代羌族的一个分支<sup>①</sup>，另一种是“鲜卑说”，认为建立西夏的拓跋部就是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党项源出鲜卑<sup>②</sup>。这场笔墨官司打了几十年，不断有人寻找新的材料，撰文支持一方或反对一方，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了断。

近年来，又不断有学者从语言学、民俗学等角度，将“藏彝走廊”某一族群与西夏党项民族直接联系起来。其中，西夏人与普米族人的亲缘关系问题，亦有学者给予关注并作了初步的探讨。1998年5月，在宁夏银川举行的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普米族青年学者胡文明先生作了题为《西夏之树常青》的发言，通过对《番汉合时掌中珠》所提供的西夏语词汇与现今普米语进行对照，发现西夏语与普米语在天干地支、日月年岁、亲属称谓、动物称谓以及人体四肢等基本词语非常一致。于是提出“党项人和普米人语言的相近，决非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族源关系，是同源异流的事物。”<sup>③</sup>日本西南学院大学王孝廉通过对居住在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与普米族的民俗与西夏人的民俗进行比照，在《从贺

兰山到泸沽湖——论摩梭普米族的民族亲缘关系及其文化遗产》一文中，认为现今摩梭人与普米族的民俗是西夏人民俗的直接传承<sup>④</sup>。近年来，笔者在收集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材料中，发现普米族人与西夏人不仅语言相近、民俗相似，在自然神灵崇拜、占卜法术以及丧葬礼仪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材料，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对两族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

### 一、从自然崇拜的相似性看两族关系

纵观党项人的宗教，其信仰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西夏建国前，藏传佛教虽逐渐传入党项族之中，但党项人主要信仰的还是原始宗教。有关党项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汉文典籍记载很简略，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早期党项人对天地、山水、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的敬畏和顶礼膜拜，并且党项人所形成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巫术占卜等原始宗教系统与现今普米族的宗教信仰非常相似。

首先，西夏党项人与普米人对天的崇拜即“天祭”具有相似性。党项人认为“天”是万物生命的源泉，天主宰着万物的繁荣和凋谢。祭天是党项人重要的原始宗教仪式，史称“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sup>⑤</sup>。党项统治者也时常自诩为“天”的使者和化身，西夏开国之君取名“元昊”，后来改为“曩霄”，意思都和“天”有关；党项官职“谟宁令”，汉译为“天大王”。就连官

府收税也要打着按天的意志行事的招牌，党项谚语“不为天敛无威仪，不争量顶斗不满”<sup>⑥</sup>。

“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的习俗在现今川滇各普米人的宗教信仰中仍有保留。“普米人的祭天，其意包括祭日月、风雨、雷电、云雾、霜雪等自然诸神。三年举行一次，一般选择在农历十月十五举行。祭祀前，族长让人在村寨附近的草坪上，用丈余长的松木料搭就三层祭台。全氏族或者全村人均筹集牺牲和祭物。按传统，每十户献一头牛，每五户献一头猪、每三户献一只羊、每一户献一只鸡，牺牲之物以白为贵。祭祀当天，全村人齐聚，请韩规（祭司）念诵《诺提》（祭天神）经。”<sup>⑦</sup>普米族的祭天仪式由来已久，据当地老祭司介绍，解放前祭天仪式耗时至少三天，如果连续有较大的天灾，仪式需要持续一个月，而遇到连续灾害的年头则一年举行一次祭天仪式。

其次，西夏人与普米人认为日月星辰能够主管人间福祸，对日、月星辰非常敬畏。西夏人谚语有“金楼玉胶天帝坐，天道云径日月行。”“大象一来河泽满，日月一出国土明。”“白日红月，明暖相续青春去，黄冬青夏，美丑驰骋为送老。”“母美艳如千白日，父智明如万红月。”“地祖天婿，力威荣昌；天女民鸽，仪态高扬。”<sup>⑧</sup>无独有偶，西夏人谚语中所表达的对日、月的敬畏和赞美之情以及日月所表征的宗教寓意，却直接反映在了现今普米族人的“宗巴拉”宗教图案文化中。

传统的普米族人家主屋内都设有“宗巴拉”<sup>⑨</sup>。“宗巴拉”上所绘制的图案有强烈的宗教文化寓意，画的最上端是云彩烘托的太阳和月亮，其中，位于右方的太阳通常为白色状，而左方呈现的是半轮红月。画的正下方是一朵盛开的红色莲花，是普米族传说中人类诞生的母体。而莲花上方是一锥形花蕾，称“帕布尔”（或巴布），意为老祖或老人。“帕布尔”上方是九岔的火焰，火焰左方是表示族称的普米象形文字，表示“骨根骨肉”之意。火焰中间偏下段左边刻绘着象征神权的海螺或称“德叠”的五色布条，右边是象征母系氏族的虎（亦有猫、象、鹿等动物）<sup>⑩</sup>。

关于普米族“宗巴拉”的来历，韩规经《宗巴拉查》（宗巴拉的来历）还有这样的描述：

天地开初，一切混沌，唯有一块长有翅

膀的白色巨石在天地之间翻腾。有一天，石头突然均匀的裂开，裂缝中夹着一头白身的公牦牛和一只黑色的母狼。黑母狼长着一对半圆型犄角，她叫“米弄米”；白公牛为平头，他叫“木巴木”。“米弄米”和“木巴木”都拼命的往裂缝外挤，相互撞得头破血流，却都没能脱身。白公牛对黑母狼说：“米弄米啊米弄米，世上只有我俩是活物，要是相互撞死了，活物也就绝种了，我往右上顶，你往左下踹，把石缝顶开，都能生存”。黑母狼说：“木巴木啊木巴木，你的主意正合我心，但我个头小，你的力气大，我把犄角先借给你”。公牦牛用黑母狼借给的犄角安在自己的头上并插入石头裂缝中。米弄米和木巴木一起使力，石头被顶成多块。夹着犄角的石头带着木巴木公牦牛一起甩向了右上方，石块变成了太阳，公牦牛变成了天神；黑母狼顶着的石头飞向了左上方成了月亮，而载着米弄米黑母狼的另一半石头则一直往下掉落，最终变成了大地，黑母狼成为了地祖。其它石块飞溅在四周成了众星星，天地日月星辰如此产生了<sup>⑪</sup>。

据当地人解释，现今普米族人的“宗巴拉”右上方所绘的太阳之所以为白色圆形状，就是公牦牛用母狼借给的半圆型犄角托着的半边白石而成。而黑母狼因为将犄角脱给了公牛，鲜血流在所顶的白石上将石头的半截染红，因此，今天所看到的普米族宗巴拉左方的月亮也就成了半月红色状。

韩规经《宗巴拉查》中还说，后来，木巴木公牦牛所变的天神来到地上归还米弄米白母狼的犄角，由于地上空旷无物，于是木巴木天神和米弄米地祖分别从自己身上拔下毛混在一起，变成了各种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其中有一对小猴，由于在“瓜韩规”（巫祖）那里学会了言语，小公猴取名“达楚韩规”，母猴取名“嘎达米”。后来，达楚韩规与嘎达米结为夫妻，衍生了人类。后代子孙把天神木巴木公牦牛和地祖米弄米白母狼在地上相会点称作“鲁木宗巴拉（弄）”（老祖宗出生地），木巴木称作木宗巴拉，米弄米称作米宗巴拉；称达楚韩规为巴拉（弄）茸（巴弄的儿子）、称嘎达米为巴拉弄米（巴弄的女儿）<sup>⑫</sup>。

上述普米族关于“宗巴拉”的来历以及所绘制的图案所表现的正是“母美艳如千白日，父智

明如万红月。”“地祖天婿，力威荣昌；天女民鸽，仪态高扬”的场景<sup>③</sup>。由此，无论作为谚语还是民俗宗教文化的图案，我们认为二者表现的方式虽然不一，但所共同反映的是生活在高原地带同为古羌人的党项人与普米族人对光明和温暖的渴望以及对日、月的敬畏和赞美，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一脉相承。

再者，西夏人与普米人还具有相同的自然山水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收藏西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所建《甘州黑水建桥碑》拓片，碑文诏告：“敕镇夷郡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现一切水土之主，山神、龙神、树神、土地神等，咸听朕命：……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sup>④</sup>

前述，普米族有专门的祭天仪式。此外，普米族还信仰山神、水神、树神、火神、中柱神和祖先神等自然神灵。普米族人每日三餐都必须向火塘铁三角敬献饭食，按天、地、祖诸神的顺序统一祭祀。每三年（有条件的一年举行一次）则要举行专门祭祀居于天上的“刺”、天地之间的“尼”、山顶的“散答”、山间的“兑”、山下的“鲁”等五种神的“尼哒子”仪式<sup>⑤</sup>。以祈求天、地、山、水、树神等诸神不让“拉日尼松”即冰雹、暴风、锈病、虫灾以及来自天地的“乃仁能噶”（人的瘟疫、伤寒）以及“果布秀尼”（牲畜瘟疫）等侵害。这些和西夏人的以天为主宰，以祖先显灵为佑助，谓之守护；以鬼为恶，谓之损害；神有天神、地神、山水神、财窝神、战争神、守护神、羊神、牛神；鬼有饿鬼、病鬼、孤鬼、厉鬼是一致的。

## 二、从鬼灵崇拜的相似性看两族关系

党项人信奉鬼神，崇尚诅咒。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8记载西夏羊卜：

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以此占主客胜负<sup>⑥</sup>。

传统的普米族人家的屋子都建有一间称作“卒乌”的后室，由正室入内，长方形，可以点火取暖，但不住人，平时放些零杂物。女子生孩子在此，三天以后才移入正房，人死后亦在此设

灵<sup>⑦</sup>。而老人送终后的灵牌象征物“弄卡”亦寄存在此处。在“卒乌”后室入口处的左或右方通常设一称“扎可”（亦作“我占安占”）的火铺<sup>⑧</sup>，由火塘、三脚架及单边称“达章”的神柜组成，代表着阳性，寓意为神灵之栖所。这一场所一般只作为家中古稀老人生活及接待德高望重的宗教祭司或贵客来访时所用。实际上，被称作“卒乌”的后室及紧连的“扎可”火铺就是专门用于祭祀鬼神的栖所，这与西夏人“常留一间，以奉鬼神”的习俗如出一辙。

此外，普米族人在正房进门的左侧还设有一个由“宗巴拉”、“黄里普”<sup>⑨</sup>、“抓玛”<sup>⑩</sup>三个层次组成的下火塘。其中，最上层靠墙处为“宗巴拉”，最下层为“黄里普”，宗巴拉与黄里普之间立“抓玛”，这一区域在普米人的观念中被认为是历代祖先的化身，相互之间连为一体，不能拆分。普米族民间的各种锅庄石以及宗巴拉传说，都与祖先崇拜的习俗有关。相传普米人最早立锅庄石的缘由，是普米族先民从昆仑山下的西北大草原迁徙到云南宁蒗之后，将从西北带来的亲人的骨殖和昆仑山崖片的融合体，供在家庭中最显眼的火塘边，以便全家朝夕聚会时祭祀祖先。锅庄石正下方（有的在火坑中央土层下）埋一个称为“块”（意为火胆）的精致陶罐。陶罐内由家中的主妇装进安雍（金银）、欠（玛瑙或彩色小石）、巴嘎尧（松子）、白热叉楚（青稞、大麦、小麦、谷子、包谷等五谷，而苦荞类、豆类则视为黑物不允许装入）、谷谱啥木（火石和火镰）及螺盖（洁净的干牦牛粪）。寄寓着普米族迁徙繁衍、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多子多孙、人寿年丰的美好祝愿。陶罐不仅是火祖的心脏，也是展现民族文化的工艺品，罐口是两条盘绕的鱼，顶部处是海螺、莲花、大海、青蛙等图案，罐腰浮雕日、月、星、云图，罐底为白绵羊、白马、白虎（猫）图案。普米族崇拜的吉祥物全汇聚罐上，堪称为普米族民族文化的结晶。

上述由“宗巴拉”、“抓玛”、“黄里普”所构成的看去普普通通的方寸之地，确乎是普米人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的中心。普米族人除饮水之外，一日三餐饮食之前或者家人外出回归、亲友来访时所带的食物都先置于锅庄石上，食用任何食物，都必先取少许食物置于锅庄石上，以敬献神灵。金沙江以南兰坪、维西等地区的普米族则直接以铁三脚代替宗巴拉，铁三脚中有一只脚朝

向宗巴拉位置,这只脚下放一块较为平整的宽大的白石片,用一根铁链把这只脚与床头柜脚相连,禁止任何人穿过或跨越。敬献茶饭时每只脚顶上都撒一点,大祭时则必须在铁三脚下的白石板上点燃香柏枝条,祭品要烟酒俱全。在腊月三十过除夕时,要放火炮三响,吹海螺,撒猪膘肉祭锅庄神<sup>④</sup>。此外,在下火塘的左、右、前三面,则设有固定的板铺,左右铺皆称“瓜国铺”,虽为日常起居所用,但其座位的主客位次有严格界定,一般主妇只能坐左边,男主人和客人坐右边,而称作“瓜满都”的前铺是青年和小孩的坐处<sup>⑤</sup>。而人死收敛尸体完毕,在祭司到来之前,亦在此设灵,尸体的放置要讲位次,男性逝者安放在火塘的右侧上方,女性逝者放在火塘的左上方,面朝堂屋门方向。

由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现今普米族下火塘的设置以及所扮演的日常祭祀的场所,正是西夏党项人“兆之上为神明,近奋处为全位,坐位者,主位也。近旁处位客位”信仰的直接传承。

### 三、从巫术的相似性看两族关系

党项族通常把巫术和占卜作为沟通人神关系的一种技能和渠道。巫在党项人中地位很高,在西夏官阶封号表中居于皇后、诸王、国师、大臣、统军之后的便是“巫位”了。而现今普米族人的韩规教所反映的巫术和占卜术的内容与党项族一致。

首先,西夏人与普米族人在巫术分类上相一致。党项人的巫术有“白巫术”和“黑巫术”之分,前者表现为防御性的祝告、会祀;后者则表现为攻击性的驱逐诅咒。对善神予以尊崇膜拜、供奉祭祀,而对恶鬼则予以诅咒、驱赶<sup>⑥</sup>。而现今普米族韩规教也分“崩韩规”(黑韩规)和“曲韩规”(白韩规)两种。虽然黑、白两种韩规在服饰、经典及祭祀仪式方面都较为相近,但两者具有实质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黑教韩规即崩韩规崇尚咒术,杀牲献祭;白教韩规即曲韩规则放弃杀牲,用象征性的模型实物代替活的生命,重祝告、会祀。

其次,西夏人与普米族人的巫师称谓及其社会地位相一致。巫师是巫术活动的直接操作者,他们是能与鬼神交通的特殊人物。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载党项人的羊卜习俗说:

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乱”。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sup>⑦</sup>。

党项族的卜师谓之“厮”、“厮乱”。现今居住在金沙江南北地区的普米族人称祭司为“厮毕”(释毕)、“释冀”或“毕乱”(毕扎)。关于“厮毕”(释毕)普米族韩规经《释毕查》(释毕的来历)开篇有这样的描述:

没有古,就没有今;没有“毕”(规矩,古理,祭祀的依据)就没有(不会有)“释”<sup>⑧</sup>祭祀活动。要做好祭祀活动,就得懂普米族的来历……<sup>⑨</sup>。

由上可知,普米族宗教语义中的“厮”原意为“祭祀”,“毕”指“依据”或者“缘由”,而“乱”在普米族语中有高、深之意。从字面上理解,“厮毕”有“祭祀缘由”之意,而“毕乱”可译作“深知缘由”。因此,“厮毕”、“毕乱”之称谓应该都源于“厮毕乱”即深知祭祀缘由者。而在普米族社会中,“深知祭祀缘由者”往往只能是祭司,因此“厮毕”、“毕乱”逐渐演变成了祭司的专门称谓。这以西夏党项族的卜师称“厮乱”相一致。

前述,巫在党项人中居于很高的地位,如同党项人的“巫位”,普米族祭司韩规在社会生活中亦有很高的地位。韩规是主持韩规教法事的神职人员,也是经史学者,普米族谚语说:“普米没有官爷,韩规就是长官。”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疑难问题总是请教韩规,因而受到大家的尊敬和崇拜,无论属于哪一个教派的韩规,对于普米百姓来说都是皈依和依靠的对象。

再者,党项族与普米族的占卜术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古史上记载党项族中盛行占卜,西夏政权建立后,统治者遇到重要事情,仍然要卜问吉凶。《宋史·夏国传》载党项:“笃信禳鬼,尚诅祝,每出兵则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髀骨以求兆,名‘灸勃焦’;……。”<sup>⑩</sup>《辽史·西夏传》亦有“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斯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sup>⑪</sup>的“送鬼”之俗。此外,《宋史·夏国传》说党项人:“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草人埋于地,众射而还。”<sup>⑫</sup>而沈括在《梦溪笔谈》记载党项人的占卜术:“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脏,谓之‘生跋焦’。其言极

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sup>③</sup>

西夏人“炙勃焦”的占卜术，即用艾草熏灼羊脾骨，视其灼裂的纹路来判断吉凶的羊卜，这与普米族人的羊卜是一样的。现今滇西北云南兰坪地区的普米族人，每逢祭鬼时祭杀的山、绵羊，在食用其肉食时，有肩胛骨必须给巫师食用的规矩。巫师食完肉，将肩胛骨拿到火堆边烧烤，根据其光色及裂纹定凶吉，呈亮视为吉，呈暗视为凶<sup>④</sup>。宁蒗地区的普米族韩规在占卜时也往往用羊脾骨预测吉凶祸福。其做法是把羊脾骨煮烧至出现裂纹，从纹理形状判断吉凶，决定祭神驱鬼活动<sup>⑤</sup>。此外，普米族创世史诗《直呆木南》（创世纪）中亦说：“‘直呆木南’洪水时代，韩规没有经书；韩规最初的经书是羊骨头的裂纹……。”说明普米族的羊骨卜具有悠久的历史。

党项人以“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脏”的“咒羊”与看羊内脏以定吉凶的习俗，这在现今普米族人的“释毕戎肯”葬礼中以活的形态存在。现今居住在金沙江南北地区的普米族人葬法虽然不同<sup>⑥</sup>，但各地普米族在丧葬中，都保留了给死者白绵羊引路北上回归祖宗故地的“给羊仪式”习俗。我们以云南丽江市宁蒗县普米族为例，当老、中年病人去世之前，家人将病人移至堂屋火塘边的床铺上，先把病者从床上扶坐起来，牵一只白绵羊<sup>⑦</sup>到其面前，让他象征性地拉着绳头，并告诉他说：“这只绵羊是给你带去的！”说完割断牵羊绳，一截留在羊的脖子上。留在病者怀里的绳头，待病者死后将与其尸体一起火化。火化（下葬）次日要举行“席肯戎肯”敬羊仪式<sup>⑧</sup>。祭祀之时，韩规或释毕用水或酒清洗羊身再用青松毛、香柏枝焚烧的香烟薰羊驱秽，念诵《箩灯尔》咒羊经。在场亲属则头系白线，脚穿草鞋，腰系麻皮，跪拜于白绵羊前，这时用醅（又作“苏里玛”，一种黄酒）和炒面喂绵羊，请求白羊引领逝者回归祖居地。白绵羊若高兴地吃喝，寓意接受主人之寄托，如果羊不吃不喝，则认为表示不悦，喂养者不能强迫。直至羊吃了炒面，喝了醅酒，全身抖动，家属才向羊磕头辞行。随即，用刀直刺羊胸，迅速取出羊心，敬献于逝去的祖先。若羊心呈深红色、少血、颤抖，表示死者接受羊祭，视为吉利，羊心不颤抖，颜色呈暗红色并伴有大量的血液则视为不吉。之后，韩规或释毕给逝者念

诵《指路经》，给亡灵指示氏族的迁徙路线，帮助其顺利回归祖先发祥地。

而西夏人缚草人杀鬼招魂的习俗，在普米族人中亦有保留。上世纪60年代，宋兆麟先生在宁蒗、盐源、木里等西番人（普米）集中居住地区考察时有这样的记录：

西番人（普米）对敌人、仇人或生育不繁等都有扎草人诅咒之术。对敌人、仇人诅咒时，先请祭司扎草人、草羊、草鸡，并准备一盛有少许金银和鸦片的陶罐。入夜之后，祭司击鼓施法，不断念诵敌人、仇人的名字，并将灌口封住，不使其透气。这时，祭司脱掉一只衣袖，半光着膀子，用牲畜血涂面和胸部，如魔鬼模样，并在房屋周围绕行三圈，作驱鬼状。以箭射死先前已备好的一只羊，煮羊肉祭祀山神，用羊血撒在草人上，用箭刺杀草人，同时咒骂敌人，并把陶罐及草人抱到村边交叉路口，将陶罐埋在地下，而草人置于路上任人踩踏。如果妇女长期不孕，亦请祭司扎一草人，为其穿上该女子的服饰，让草人背一布袋，内盛荞麦、猪、羊和牛骨头，并在火塘中烧一石块，丢在布袋内。杀牛、羊以祭山神，祭司念诵《米勒不吉季》经，用牛羊血涂抹草人，然后将草人送到山外将其捆在一大树上<sup>⑨</sup>。

由此看来，西夏人与普米族人在占卜、驱鬼的巫术功能上又极其一致。

#### 四、从葬礼习俗的相似性看两族关系

丧葬习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现实生活状况的反应，西夏人与普米族的丧葬习俗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两者葬俗的比较，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两族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以及二者的民族渊源关系。

据史书记载，党项族在甘、青、川一带居住时，主要实行火葬。北迁后建国前，大多数贵族已实行土葬，但仍要“凿石为穴”，不起坟堆，“后人莫知其处”<sup>⑩</sup>。有关西夏人的葬俗，《西夏纪事本末》中有“用彩缯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毡，椎牛设祭，乃以其草密加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为高丈，呼为女栅，迁尸于上，云于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sup>⑪</sup>。《旧唐书·党项传》亦载：“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而《文海》“烧尸”条有：“火上烧化尸体

之谓”。又“丘墓也，烧尸处骨尸所围之谓。”<sup>③</sup>而宋毕仲游《乞理会河东土俗埋葬札子》云：“中民以下，亲戚丧亡，即焚其尸，纳之缸中，寄放僧寺与墓户之家，类不举葬。”<sup>④</sup>河东乃党项居地之一。近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又在贺兰山东麓发现了一批用陶罐盛骨灰的党项平民火葬墓<sup>⑤</sup>。此外，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经过西夏故地（唐古特州）时，对西夏遗民的焚尸之俗则有更详细的记录：

焚前，死者之亲属在丧柩经过之道中，建一木屋，覆以金锦绸缎。柩过此屋时，屋中人呈献酒肉及其他食物于尸前，盖以死者在彼世享受如同时。迨至焚尸之所，亲属等先行预备纸扎之人、马、骆驼、钱币与尸共焚。据云，死者彼世因此得到奴婢、牲畜、钱财等，若所焚之数。柩行时，鸣一切乐器。其焚尸也，必须请星者选择吉日，未至其日，停尸于家，有时停至六月之久。其停尸也，方法如下。先装一匣，匣壁厚有一掌，接合甚密。施以绘画，置樟脑香料不少于匣子，以避臭气。旋以美丽布帛覆于尸上。停丧之时，每日必陈食于柩前桌上，供死者之魂饮食。陈食之时，与常人食时相等，一其尤怪者，卜人有时谓不宜从门出丧，必须破墙而出，此地一切偶像教徒焚尸之法皆如是也<sup>⑥</sup>。

而陈炳应在谈及西夏葬俗时有“党项的火葬是先将尸体烧成骨灰，然后进行掩埋，武威发现的两座西夏墓就是以“灵匣”装骨灰进行安葬，葬具是木缘塔。”<sup>⑦</sup>

上述文献所记载的西夏人火葬仪式，与历史与今天居住在滇西地区的普米人所保留的丧葬礼仪几乎一致。

普米族人“殁后不用棺槨，以麻布缠裹火化，并无坟冢”之俗早在光绪《续修永北直隶厅志》卷7中有记载。而至今，金沙江以北宁蒗地区的普米人仍然实行火葬。人死收敛尸体完毕，先用棉被包裹后以蹲状安放在堂屋火塘旁。之后，请韩规或释毕祭司根据逝者离世的时辰、家庭成员的生辰进行占卜，确定设灵期，停灵时间从一天至数月不等，如果停灵时间较长，在后室<sup>⑧</sup>内挖一洞穴称“扎豆”，将包裹后的尸体寄存此穴，上盖黄板，涂上泥巴。为防止尸体腐烂发臭，多在封盖上插一根空心青竹竿将气体接向

空中，也有说是作为灵魂出入所用。如果停灵期不长，则将捆绑好的尸体再移入一称作“苟”的棺木匣内<sup>⑨</sup>。将“苟”放置在堂屋正中的上火铺靠墙处，面朝堂屋门。“苟”与“宗巴拉”之间则用五色布制成的“谷氏”的布条屏障将两者遮隔，“苟”的上面覆盖有一床用白绵羊毛制成的披毡，并用五种不同颜色的布条加以装饰。

停丧期间，每日在灵柩前的灵桌上供奉一碗米饭、一碗大头肉、一杯茶、一杯酒、一双筷子，并用植物油点一盏长明灯，而“宗巴拉”前的灯则须熄灭。

火化前一天，要进行“森季同”即架设火葬场。由逝者之子或者女婿一人随同有经验的男性亲友5人前往，在选定的火葬场用生松树劈柴搭建高约一米五尺，长宽大约一米的形似木楞房的空心四方形架子（普米人叫“森季”），逝者为女性要搭建七层，男性则搭建九层，并且柴表层面朝内。

出殡前大约数小时，由逝者亲属将“苟”抬出堂屋，并放置在先前在主堂屋外或送葬之路上用青松枝搭建一形似屋子的祭坛内。毕扎要在此处举行“素齐松懂”（给逝者饭食）、“格瓦肯”（死后安顺）、“菊几”（将生者的魂喊回堂屋）。村邻右舍纷纷前来祭献财物，他们用五色布条且以麻代线、用松明替针缝制两个小袋，内装油、盐、茶、米等，其中一个布袋祭献逝者，另一个则委托逝者带给祭献者已故祖先。毕扎用夸张的口吻告诫逝者，生者已祭献了成千上万财物，希望已故者能保佑生者平安。之后，逝者家属按辈分及年龄大小依次跪地“搭桥”，长者在后，成一字形排列。众人抬着“苟”（棺材）从孝子头上经过。其后为两名手持大刀、长矛的武士状之人做引路先锋，他们跳着特殊舞步，当“苟”从孝子头上经过时，参加出殡者都齐声呐喊，引路先锋也要手舞足蹈一番而随行韩规则沿途敲锣打鼓，吹螺击钵。送葬队伍到达火葬场之后，要抬着“苟”按顺时针方向绕“森季”行三圈，然后将“苟”架在“森季”木架上，面朝北方，意为祖先从北方迁徙而来。韩规则端坐在“苟”的上方，面向“苟”的方向，诵《素齐》经。诵完经由四位韩规分别从“森季”的四方底部点火焚烧尸体。

焚完尸后的第二天早晨，孝子或家族男子到火化场拣遗骨。拈十三截骨头放入一陶罐里，送

到“入久甸朵”(以氏族为单位的寄罐林)。到了寄罐林,用一绵羊披毡铺开在地上,其上用炒面绘制一“雍忠”符号和一只雄性马鹿图像,并将骨灰罐放在马鹿图像前。之后,韩规、毕扎要念诵《雍忠得达若巴》(骨灰安置经)安放骨灰罐。骨灰罐存放方式各地稍有不同,有的放置在崖洞里、有的放在树下用几个石头围砌。而火化场焚死者的火堆上,则用泥土和石头砌一堆坟,坟底做一道小门,寓意让灵魂进出。

由此,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所见到的西夏火葬焚尸之方式,均与现今我们所见的普米族人的丧葬方式相合。

此外,在普米族人观念中,人死是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他们认为没有不死的树,没有不死的动物,也没有不死的人。年纪大的人会死,刚出生的婴儿会死,男人会死,女人会死,做官的会死,做吏的会死,富人会死,穷人也死。因此,除了把服毒死亡、套索上掉、跌崖摔亡、为匪为盗及夭折等一类死亡视作“不吉之身”外,将人的死亡,尤其是上了八十岁的老年人亡故视为喜事。因此,葬礼结束即骨灰罐安放完毕当晚,主人家要找四个男子妆扮成两男两女称作“瑟牙阁尔”,在主人家房屋前后相互调戏。同村的众男、女也参与到游戏中。尔后,全村齐聚饮酒作乐,弹奏琵琶、吹奏竹笛,举行“甲措”即跳锅庄舞,意为丧事已结束,老人已送终,青年男女重新欢快地投入新生活。这又与《隋书·党项传》所记载“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罐为节”相一致。

### 结 语

通观普米族人与西夏人的自然山水崇拜、鬼灵崇拜、占卜法术以及葬礼仪式,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两个民族在不同时代所呈现的宗教信仰却如此的一致,尤其党项人“所居正寝,常留一间以奉神鬼”以及“咒粟以食羊,羊摇其首,杀羊视其五脏”之习俗,在现今普米族人宗教巫术信仰中更有直接的传承。由此,我们认为,这种相同性,不只是文化的巧合,它所折射的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源流、亲缘及迁徙的痕迹。

(责任编辑:又小易)

米族宗教研究”(项目编号:09XZJ014)的阶段  
性成果。

- ①李范文:《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②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 ③胡文明:《普米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
- ④[日]王孝廉:《从贺兰山到泸沽湖——论摩梭普米族的民族亲缘关系及其文化传承》,《丝绸之路》2001年第S1期。
- ⑤[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83,《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册第1845页。
- ⑥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64页。
- ⑦杨照辉:《川滇民族巫占与禁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民族文学研究集刊》(11),1997年4月,第65—66页。
- ⑧参见罗矛昆先生译的西夏古谚《中国谚语集成》(宁夏卷)。
- ⑨宗巴拉:普米语称为“尼吉达补阿伊宗巴拉”,简称“宗巴拉”。即在堂屋下火塘正后方墙壁的神龛中所供的一块高约1米、宽约0.7米,并刻有宗教符号的锥形体白石(亦见有用木材或者黏土替代的)此白石为火祖母神,亦有始祖神、财产神之意。
- ⑩相关内容还参见章虹宇:《普米族的“括鲁”与“仲巴拉”》,《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
- ⑪引自本文作者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普米族韩规古籍译注》之《宗巴拉查》(宗巴拉的来历)。
- ⑫相近的故事还见20世纪80年代章虹宇在云南宁蒗、四川木里、盐源、西昌等地所收集的普米民间故事,见王震亚《普米族民间故事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9—36页。
- ⑬日本西南学院大学王孝廉先生还认为,贺兰山口岩画神像旁边有象征植物生长的棉状植物,旁边的一行西夏题记,译成汉文是“正法苗昌”。这些神像是西夏党项羌人所崇拜和祭祀的原始母神,象征着丰收、生殖和守护。是西夏人的“宗巴拉”。参见[日]王孝廉《从贺兰山到泸沽湖——论摩梭普米族的民族亲缘关系及其文化传承》,《丝绸之路》2001年第S1期。
- ⑭[清]叶昌炽撰,韩说校注:《语石校注》,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99—100页。
- ⑮“尼啞子”仪式通常在农历正月至二月间举行,仪式长达四天,有固定的祭祀场,一般选择在村庄上方,森林茂盛,水源较好的地点。仪式期间还要搭建专门用以祭祀天神“拉惹巴各布”、“拉一稳布佳吉”、“拉督宋松吉”,天和地之间的“益西丁巴辛饶”、“冬松袞拉阁布”、“贡子菩吉

- 佳布”神以及地神“贡嘎仁松衮布”、“帕巴辛仁责”(由男子变的女神名)、“君碧牙”、“千那帝季”、“松吉慈巴米”、“松吉日怎督玛”、“松吉那窘玛”神的坛场。期间,参与祭祀的村民以及祭司韩规都在山上露宿。
- ⑮ [宋] 沈括撰,侯真平校点:《梦溪笔谈》,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32页。
- ⑯ 宋兆麟:《泸沽湖畔的普米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0—441页。
- ⑰ 传统的普米族人家,通常在主屋内设有上下两个火铺,上火铺称“扎可”(亦称“我占安占”)代表着阳性,寓意为神之栖所,由火塘、三脚架及单边“达章”神柜组成。通常作为家中古稀老人生活及接待德高望重的宗教祭司或贵客来访时所用。下火铺由“黄里普”、“宗巴拉”及其两边的“达章”神柜三部分构成,为日常献祭及烧火煮饭等起居所用。
- ⑱ 黄里普:普米族人设在堂屋内的一个火塘,由“辛爪”(铁三角)和“谷冬”(火塘坑)构成。火塘为长方形石砌的火坑,长度无统一规定,一般长在1米5左右,宽在9尺左右。
- ⑲ 抓玛:又称刮泽或括鲁,普米族人立在宗巴拉与黄里普之间的一块约长12寸、宽8寸、厚4寸的长方形或圆形白色条石,即锅庄石。
- ⑳ 熊贵华:《普米族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 ㉑ 宋兆麟:《泸沽湖畔的普米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0页。
- ㉒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64页。
- ㉓ [宋] 沈括撰,侯真平校点:《梦溪笔谈》,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32页。
- ㉔ 释:又作“释毕戎肯”、“释布戎毕”或“释肯戎肯”,这里专指普米族葬礼习俗中独特的“献绵羊”祭祀仪式。
- ㉕ 引自本文作者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普米族韩规古籍译注》之《释毕查》(释毕的来历)。
- ㉖ [元] 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册第14029页。
- ㉗ 《辽史·西夏外纪》第115卷,《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6916页。
- ㉘ [元] 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册第14029页。
- ㉙ [宋] 沈括撰,侯真平校点:《梦溪笔谈》,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32页。
- ㉚ 杨照辉:《川滇民族的巫占与禁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1997年,第96页。
- ㉛ 胡文明:《普米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37页。
- ㉜ 普米族先民曾一度实行火葬,并有二次葬的习俗。清雍正改土归流后,致使一些西南少数民族改行土葬,清朝中期云南丽江、维西、兰坪的普米族开始实行土葬,而宁蒗、永胜等地的普米族至今仍实行火葬。
- ㉝ 对祭祀所用牺牲的绵羊,要视死者性别而定,若系男性则选取一只母绵羊,女性则选取一只公绵羊,选取之羊以高大壮硕、毛色雪白为最佳。
- ㉞ “席肯戎肯”敬羊仪式又作“作羊会”,一般耗时三天以上,由于需要花费大量的财物,过去,许多家庭在下葬之时无力及时举行此仪式,因此,传统的普米族人选择了二次葬的习俗,在尸体焚化三年之后,甚至更长时间以准备足够的财物并选择一个吉日来举行此仪式。
- ㉟ 宋兆麟:《泸沽湖畔的普米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08页。
- ㊱ [清] 吴广成撰:《西夏书事》卷7,《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4册第349页。
- ㊲ [清] 张鉴撰:《西夏纪事本末》卷10,《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7册,第575页。
- ㊳ 《文海研究》75·242,13·271,43·262条。
- ㊴ [明] 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116《风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6册第297页。
- ㊵ 《宁夏首次发现西夏火葬墓》,转引自《新华文摘》1985年第5期第67页。
- ㊶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第1卷57章。
- ㊷ 陈炳应:《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题记、葬俗略题说》,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 ㊸ 传统的普米族人家的屋子都建有一间称作“卒乌”的后室,由正室入内,长方形,可以点火取暖,平时方些另杂物。女子生孩子在此,三天以后才移入正房。人死后亦在此设灵。
- ㊹ “苟”指棺木。普米族人的“苟”为形似轿子的木楞房,用香柏树或松树细圆木刳成。